走进历史现场:论“田野工作”与大学历史本科教学

张 侃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0)

[关键词]田野工作,历史学,本科教学,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2-0066-04

厦门大学历史系长期提倡“走向民间、走向田野”的实践教学模式,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独特的教学风格,1998 年以来依照新世纪人才需求的特点,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形成了“注重实践”的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

“田野工作”也叫田野调查,原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既是一种实地观察和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更是一项涵盖面很广的复杂的文化活动,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理论的架构。由于具有可控制的工作流程和现实效果,将其援引到历史教学,有利于本科生多种能力的培养。本文将根据厦门大学历史系同仁已做的工作,就“田野工作”对大学历史本科教学的理论意义、具体实践、难点等方面展开进一步说明,敬请批评指正。

一、“田野工作”适应了史学发展对历史教学的挑战,有利于学生理解“新史学”的内涵,把握住史学研究的“变”与“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引用了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狄金森的话总结了当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和学科特点:“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1](p.1)所谓的“重大革命”,就是在新史学的实践过程中,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了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认识。具体而言,“新视角”就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去考察某一历史现象,将之看成是历史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力求构建、恢复历史社会的总体面貌,主张研究“人的历史”“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新对象”就是历史学家将“视线的下移”,从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深入至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将研究重点从传统的、简单化的政治史、王朝史转化为关注民众的心态、风俗的变迁、民间的宗教与文化、基层社会组织等等。“新方法”就是随着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所涉及的问题往往不是传统史学自身所能解决的,必须同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和合作,如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广泛运用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口述方法等。史学转型已经影响了中国史学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研究取向,但是本科生还处于初学的阶段,不同于研究生,还无法在专题研究上去追踪史学的新发展,而“田野工作”能给他们最直接感受“新史学”所提倡的“新视野、新对象、新方法”的机会。

“田野工作”脱胎于人类学。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自始至终侧重于对文化全貌性的考察,一般而言,他们往往以特定的社区为研究对象,既要关注社区与社区内的人在空间上的共时性结构,又要追问社区在时间上的历时性变迁,同时还要观察社区内与社区外的关系,“社会整体”观非常强。不言而喻,本科生一旦进入社区,一旦开展“田野工作”,他们会感受到历史是有机的整体,发现各种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互相发生作用的,自然而然获得一个“整体”史观,传统教材中所表述的“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文化归文化”的支离破碎的历史图景被抛弃了。与此同时,“田野工作”直接面对民众,直接观察日常生活,最能实现“从下而上”的历史观。通过“田野工作”,往往能很快地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大传统”、什么是“小传统”,什么是“制度”、什么是“民俗”、什么是“地方性知识”,真正使“历史走向民间”。

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经历可以说是本科教学中可以推行“田野工作”有力佐证:“实在说,我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1939 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

【收稿日期】2007-11-18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2]

由于讲求整体，“田野工作”是面面俱到的“微型研究”，按照费孝通的说法，“需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不是泛泛的表面化的描绘。我们的分析不仅要有地点、有时间、有人物，还要有行为、有感情、有思想，把作为一个类型的某一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解剖得清清楚楚”[3](p.18)。因此，“田野工作”中，分析一个社区的族群、生计、家庭、宗教等，仅仅有历史学的知识是不够，它需要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的配合，如果涉及生态、聚落、建筑等，则需要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理学、建筑学的知识，而且，绘图、测算、统计、访谈、问卷等方法也会普遍使用。各种方法在“田野工作”达到了高度的整合，也能使最直接地使用这些方法。

二、面对“后现代思潮”的挑战，“田野工作”能提升学生的“文献”搜集、阅读和理解能力，保持历史学“不变”的学科本位

历史学在本质上就是“文献学”，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从古至今，历史学最擅长的就是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诠释。兰克学派成为近代史学的起源也在于此，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之际，傅斯年先生所提及的“史料即史学”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说明问题，他进一步明确：“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换句话说，历史的研究能直接研究材料，则历史会有很大的进步。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其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以前都是利用文献，如果能扩大更多的材料的话，那学问就有前途了！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其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也就是研究的工具能够采纳的学科的话，这门学问可以有更大的发展。”[4]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傅斯年所提倡的“文献”功夫，它实际上与“田野”有着极大的关联。傅斯年的名言就是：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语所当时最关心的方法是利用考古发掘、语言和民族调查所获得的新资料研究历史。如今随着史学视野的进一步开拓，“文献”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大，档案、碑刻、日记、书信、契约、科仪书、族谱、账本、戏曲唱本、民间传说、签诗等民间文献均已成为重要的文献，同时，雕塑、画像、庙宇、祠堂、纪念碑、坟墓、日常生活与生产用具等实物也成为“文献”的组成部分。另外，戏曲表演、宗教仪式以及各种仪礼活动也是“文献”所涵盖的内容。因此根据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只要进入“田野”，马上就有第一手的材料可供学生搜集，通过“田野工作”，学生们就体悟到如何搜集第一手的文献以及如何发现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的方法。

通过“田野工作”培养学生搜集“文献”的能力还只是进入“史学实践”的一个初始环节。实际上，“文献”并不可靠，即使日记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也不例外，因此，在20世纪的下半叶，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文献”被质疑，“历史真实”被质疑，如德里达所言：“文本之外无它物”，将所有的史学典籍都给解构了，且不论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的冲击是利或弊，但它们的提问却是历史学科要面对，于是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文献”的构成。

文献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实体的文献，它的内容是对社会实践的反映，但它的创作、形成，离不开广泛社会因素的参与。也从来不曾避开社会性的影响，文献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文献撰写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阶级倾向、社会经验、角色身份都必然要带到文献中去。由于“文献”与社会脉络、相关事物和处境相联系，因此就一直有提供进一步的意义的潜力，而且任何书写而成的内容都会传达作者不曾表达或可能不想表达的意义。

在这层意义上，就不能就“文献”论文献，“文献”的内容也许不是历史事实，但是文献背后所反映的却是历史事实，这就是历史学科在“文献学”上给后现代的回答。因此，“文献”的解读，可以采用韦伯的方法，他在探讨社会问题时，提出了“诠释的了解”（Verstehen），即“了解”是一种植根于历史文化脉络的诠释。换而言之，“诠释的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能够将文献置于历史情境中掌握其意义。若脱离原有特定的历史情境，诠释的了解便不可能。用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话，就是“厚描述”。

显然，短时间让学生在图书馆里解读文献，梳理出文献所关涉的历史脉络，分析文献的生产、消费过程很难，但是如果进入“田野”，面对着与历史情境直接衔接的“文献”，面对着在现实中还有社会功能的族谱、契约等文献，他们就会对“文献”有了与传统史学不一样的理解，就会追问：文献活动与社会活动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文献的社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会基础是什么，文献又有怎样的价值、功能？尤其是文献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有怎样的过程、内容、组织形式和社会控制途径？而“文献”在历史情境之下，所包含的层累的历史意义也会被剥离，文献所涉及的制度、人名、地名、社会关系、传承系统，都会被一一定位，“文献”不再是死的，它萌生了一个“意义的网络”，以郑振满教授的话来讲，这是一种“厚阅读”。这才是历史学人才培养的“真功夫”。

三、“田野工作”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实际工作能力和日常生活态度

“田野工作”工作是规范的，具有科学的程序。从工作的程序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1. 准备工作阶段：(1)明确目的，拟定提纲；(2)摸清情况，查阅资料；(3)组织分工，建立合作制度。这一阶段是案头工作。根据调查内容的要求，搜集研究成果，作为主要参考，同时从资料中进一步找出所需要深入调查了解诸种问题的关键所在。2. 实地调查阶段：(1)开好调查会；(2)个别访问；(3)及时搜集资料。实地调查阶段要做到腿勤（联系）、眼勤（观察）、口勤（提问）、脑勤（开动脑筋）和手勤（做好田野笔记）。其中记录要准确，系统。3. 整理分析阶段：(1)分类整理；(2)分析问题；(3)综合意见。根据已经掌握的各种文献，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见解。规范的、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是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所无法接触到，而且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田野工作”任务，这直接培养了他们的科学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将来进一步深造时，具备良好的工作规范，另一方面，即使将来走向工作岗位，也有利于他们潜力的发挥。

除此之外，在“田野工作”，涉及调查研究者和被调查研究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多方位、多层次的逻辑结构过程，涉及调查者在思想观念和心理上对异文化的认识和适应过程，“如何理解他人”成为必须要经历的工作环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曾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5](p.25)这种交流在田野的口述史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史学家可以选择自己得访谈对象，而被访谈者也有表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这种相对公平的交流有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培养，进而在生活中能“宽容”待人。马克·布洛赫曾对“理解”有过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只要历史学能抛弃它那假天使的架子，就能避免上述弱点。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6](p.105)

四、大学历史本科教学中的“田野工作”是一个由课程体系和实践实习组成的整体

从知识的发展过程来看，每一个知识领域都有其独特的知识系统，也有其不同的概念结构的方法，这是构成学科发展方向的基础，体现在教学上也同样如此，需要按照学科特点来设置相关教学内容。厦门大学历史系根据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现有的师资力量，认为“田野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等同于实习，更不能等同于现在一些高校“游山玩水”“参观古迹”的实习，它是一个由课程体系和多种实践实习组成的整体。只有这样，才不能使学生成为学科知识的消极性服从的奴隶，而使设法通过引导，使他们进入学科知识的殿堂，去体会积极性的教学目标。

“田野工作”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很难在短时间的实践过程中完成，知识储备不足，进入“田野”，犹如无头苍蝇，将会事倍功半。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首要的措施，只有课程体系与实践实习的有机结合，有效配套，学生才能全面掌握“田野工作”从理论到操作程序的整个知识体系，达到能力培养的目的。

课程体系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理论知识，除了在《史学概论》中重点介绍新史学的新发展之外，开设有《历史人类学导论》《法国年鉴学派研究》《民国史学流派与史学方法》等，促使转变史学观念。第二层次是方法论，开设《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乡土社会历史调查》。此外，利用厦门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提倡选修统计学、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课程，尤其利用人类学与历史学长期有合作的历史渊源，鼓励学生选修人类学的相关课程。第三层次是制度史的课程，制度史是展开“田野工作”的基础，历史学的“田野”不同人类学的“田野”，关注了制度，才能注重国家与社会的统一，“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一体，“礼仪”与“习俗”的结合，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按照刘志伟和陈春声教授的说法，历史学通过“田野”是“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鉴于此，我们开设了《中国地方基层行政制度》《传统历史文化与村落社会》《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等专题课程，同时，在《中国经济史》课程中着重讲述赋役制度、租佃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在《中国社会史》课程中着重讲述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宗族制度等等。第四层次是课程体系中的核心，由于要在“田野”中训练学生的“文献”搜集和阅读能力，而学生在田野中遇到的不是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书馆所藏的历史文献，而是各类民间历史文献，因此开设了《民间历史文献学导论》《地方志导读》《金石导读》《契约文书导读》《宗教科仪书导读》《族谱导读》《日用杂书导读》等课程，使学生在进入“田野”之前能了解这些文献的基本状况，以及它能揭示的历史内容和它们在民间社会的文化意义。

“实践实习”是“田野工作”的直接体现，也分为多个环节。第一，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田野考察，比如在校园附近的村落，均是田野考察的对象，可以花一个半天，由相关老师带队，参观村里的庙宇、祠堂，观摩他们的各种仪式。第二，结合课程，进行文献解读，比如《碑刻的搜集与选读》就可以到村落里找到碑刻实物，结合当地的情境进行解读，并辅之以口述访谈。第三，有计划地指导学生利用寒暑假回家机会，进行民间历史文献搜集和社区历史调查。第四，集中实习，在“田野”中开展系统工作。

其中，第四个环节是“田野工作”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首先要选择“工作点”。“工作点”不是随便确定的，一般有两个考虑，一是它的历史境况保持得相对完整，能提供给学生以历史感受，能产生“田野”激情；二是实习带队老师对它十分了解，最好是带队老师的“田野工作点”，因为这样有利于实习计划编制时对于实习点调查的把握，便于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实习，易达到实践创新的目的。同时在“田野工作”中，老师也能进行有效指导，并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其次，进行相关知识的准备。由于带队老师对“工作点”的相对了解，能提供基本信息给大家，同学们花1～2个星期阅读地方史志或者在学校图书馆能找到的相关文献等，便于了解背景知识。同时开始设计调查计划和研究计划，分设田野调查组。第三，进入“工作点”，和当地百姓生活在一起，开展实质性的“田野工作”，一般需要10天或半个月，对“工作点”进行“地毯式”调查，并且每天要交流工作进度和心得体会，并根据情况调整调查计划和研究计划。第四，回到学校，各小组整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撰写分报告，同时，根据设计的目标，最后要整合为有系统、能够反映“工作点”历史结构变迁的、具有整体性的田野书面报告。为了检验工作成果，每位学生（或者每个实习小组）除了需要提交书面实习报告，并且要运用多媒体给全系师生作实习汇报，由考核小组给予成绩评定。

五、难点

面对着新史学的挑战，历史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进入“史学革命”的进程，在大学本科历史教学中援引了“田野工作”的教学方式，并将其体系化，对历史教学提出新要求，也产生新的难题。

第一，经费保障的困难。“走出书斋、进入历史现场”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经费的支持。在大学现行教学体制中，文科长期忽视“实验”性课程的建设，虽然一直在提倡实践创新，但无论政策，还是措施都没有制度的建立，因此“田野工作”没有经费保障。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具体工作看，每年拨出2～3万块钱让学生完成10来天的“田野工作”，捉襟见肘。选择的“工作点”大都是贫苦山村，刨去交通费用之外，每人每天食宿大约只能在10～15元左右。有时迫于经费困难，只能缩短时间。

第二，师资队伍的困难。传统史学一般是不注重“民间”历史文献的使用，能够系统使用和解读民间历史文献的历史教师不多，厦门大学历史系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有一定的积累，在师资力量有一定基础，但是相对于整个课程设置而言，还是师资缺乏，现有课程无法细化。另外，“田野工作”对实习教师的要求很高，不仅有历史学的训练，最好有人类学、社会学的训练，这样师资更是难得。师资缺乏成为课程体系和实践实习相结合的瓶颈。

第三，学科共识的困难。历史学科涵盖范围很广，门类众多，培养途径各异，因此“田野工作”的效果表现也不同。一般而言，“田野工作”在中国史领域能达到直接的效果，学生经过各个环节的训练之后，如果对中国史感兴趣，特别是宋明之后的社会历史，就能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走下去，并取得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但从这两年的经验来看，继续在世界史领域深造的学生，经过了“田野工作”训练，直接效果不那么明显，因此他们会对这种训练方式提出质疑，没有取得学科的共识。

【作者简介】张侃，1972年生，浙江温州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人类学。

【责任编辑：蔡世华】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序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J]．文史哲 1983(2).

[3]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1996.

[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

[5] 卡尔．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